

逆行天使的温情与美丽

——许诺晨长篇小说《逆行天使》品读

□ 薛贤荣(作家 编辑)



2020年1月19日,农历己亥年腊月二十五。这一天,国家卫健委陆续向全国各省份派出工作组,指导做好疫情防控的相关工作,第一时间向世界卫生组织共享新型冠状病毒基因序列。这一天,也是青年作家许诺晨长篇小说《逆行天使》故事的起始日。

《逆行天使》全景式描写了中国武汉抗疫全过程。这是发生在和平年代的一场特殊战争。敌人是无比微小而又无比凶残的新冠病毒,你不知道它在何时何地何人发起攻击,而人一旦中招,便凶险无比。奋起直接阻击病毒的,便是被誉为“逆行天使”的医护人员。逆行,就是反常规前行,迎着危险往前冲;天使,便是上帝的使者,拯救人类苦难的人。这是对医护人员的崇敬之称。在那些个紧张奋战的日日夜夜,普通人一提到“逆行天

使”这四个字,立马就会浮现出“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壮场面,以及“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英雄气概。《逆行天使》通过一幅幅画面、一个个场景,向读者展示了那些奋不顾身奋战在一线的白衣战士。一方面,他们是敢于直面瘟疫的勇士;另一方面,他们又是成长在和平年代的普通人。他们有家庭,有爱人,有父母,有子女;他们有爱情,有亲情,有追求,有不合……但大敌当前,他们共同的身份是战士,共同的信念是“无我”。这是一本催人泪下,催人奋进的书。

真实是一种感人的魅力,是艺术的美;反之,“在艺术所谓丑的,那就是虚假的、做作的东西”(罗丹《艺术论》)。《逆行天使》首先来源于生活。我们在阅读作品时,常常会不由自主地想到武汉抗疫时真实发生的事件。其中许多感人至深的故事,在书中都能找到影子。当然,仅仅如此还不够,作品的真实之美,还来自于作家的真诚,正如徐鲁在《一曲白衣执甲的英雄赞歌》中所说:“真实感人的故事里,呈现着清晰而明亮的价值观。”

作家笔下的白衣战士许依依、张梓文、方小骅、刘星、杜元霄,警官吴超群,发廊老板周睿,众多病人及家属,并不是凭空而来的,都具有真实的生活原型。诚如作家在后记中所说:“故事里的许依依、方小骅、张梓文,在生活中都确有其人。”

把生活的真实转化为艺术的逼真,依赖于作家的经验和才华。许诺晨虽然年轻,却有丰富的创作经验和艺术才华,她经常能够直接从生活中发现别人熟视无睹的题材和其中包含的令人感动、令人深思和令人猛醒的生活真谛,并且用自己独特的方式表现出来,而不是自觉不自觉地重复已有的主题和人物,不刻意套用流行的表现方式。这部作品,做到了“能够完全地把经验传达出来,并使它成为没有人曾经传达过的经验”(《海

明威研究》)。

新冠疫情是个突发事件,人们猝不及防。对其作出艺术反映,通常以摄影、绘画、诗歌、散文为多,而用长篇小说的形式,难度太大。许诺晨勇于尝试,并获得成功,可喜可贺。这部小说“是一曲白衣执甲的英雄赞歌,也是一部献给少年读者的生命教育美德之书”(徐鲁),其主题的宏大与厚重显而易见。小说以第三人称写成,并未用全知全能的眼光来看待疫情,而是试用不同视角,从医生、护士、警察、教师、普通患者和海外侨胞的眼睛来看待这场灾难,而且在变化中推动情节进展,构筑长篇小说的艺术大厦。正如作者在后记中所说:“《逆行天使》中有医生护士、警察、军人、教师……每个人对疫情都有自己的理解,有得到和失去,有遗憾和成长。我希望从不同视角,给小读者们讲述抗疫故事,让他们认识到美好生活来之不易,也能明白只有医疗、教育、科技、军事才是民族复兴的希望。”窃以为,作者的目的已经达到。

品读小说是离不开人物形象这个环节的。小说艺术是否上乘,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人物形象的塑造是否成功。《逆行天使》中人物众多,作家刻意塑造的中心人物是白衣战士的群像。“我将无我,奋力抗疫”是他们的共性,在此基础上,作家赋予每个人物以不同的个性,许依依的默默坚守、张梓文的热情奔放、刘星的外冷内热、杜元霄的恪守医道,都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围绕中心人物出现的患者群、警察群、志愿者群,着墨虽不多,也都个性鲜明,称得上人物宝库的“这一个”,无可替代。

中国的抗疫故事令人感动,读者们一直期待着中国作家能够讲好中国的抗疫故事。许诺晨交出了令人满意的答卷。

一唱三叹“庇民侯”

□ 杭州 乔国良

寓所离京杭大运河末端杭州段仅一箭之地,在运河边遛弯就成了我的常事和乐事。河西侧得胜桥下一处廊榭,是我遛弯时常打卡的一个景点。廊榭总有30多个平方米,坐西面东,廊下10多米就是运河了,廊榭正面正中有匾额,上书“庇民侯”三字;廊榭内有半身塑像一尊,便是这位庇民侯爷了。此处遮风挡雨既可小憩,又可观赏古老又年轻的大运河!运河边的土地寸土寸金,需要宣扬需要凸显的人物、事件、景点多了去了,杭州人如此精心选择场地建筑这个专属某人的廊榭,可见对这位名头算不得响亮的庇民侯情有独钟!

阅读运河杭州段史料,寻访数位运河研究者,方知这位庇民侯来自桐城县乡下,就是后来诞生桐城文派、发生“六尺巷”故事的那地方。北宋宋徽宗时期人,名叫左世裕,在家排行老八,又叫左八郎。约于徽宗大观四年(1110)他和妻子王氏离开龙眠河故乡来杭州贩米,稍后在米市巷开了一间名叫“诚济”的米店。左八郎的经商行事与店名“诚济”形神相合名副其实,严戒缺斤短两、以次充好,讲究的是童叟无欺、和气生财,还时不时接济实在无钱买米的穷苦人,对一些老弱病残还送米到家,雪中送炭。诚实守信得到的回报是生意兴隆、财源广进。米店紧挨运河和古新河交汇处,那年古新河上的老桥坏了,此桥是南北交通要冲,左世裕主动慷慨解囊在原址新造了一座单孔石桥,不少人的断桥之忧一下冰释!为桥起名时附近百姓一起大呼“左家桥”,于是桥名在呼喊声中落地。扶危济困,造桥铺路等等善举润物无声,左世裕声名鹊起,“左善人”三字不胫而走。

那年从春至秋滴雨未下,这在雨水丰沛的江南罕见,田地绝收,大批饥民涌进杭州城。许多粮商认为这是天降“商机”,便将粮食囤积,乘机

哄抬粮价。此种无异趁火打劫的行径让饥民深陷绝境,饿殍随处可见。身为具有一定规模与实力的粮商,左八郎是有赚得钵满盆满的一次大机会的。在“利”与“义”的抉择中,他毫不犹豫选择了“义”!他在同行中奔走游说,呼吁他们开仓赈灾,起码平价或低价出售。但“利”是有强大诱惑力的,有时可以成为一副摧毁人性泯灭良心的毒药。

响应左世裕的同行寥寥无几!大厦将倾独柱难支,但左世裕还是勇敢地当了这根柱子!他将自家粮店的粮食救助灾民,粮食吃光了,就用自己的钱财购进粮食继续救助灾民,钱财散尽了,他动员妻子典卖首饰来购粮食!他用全部身家来救助灾民。传说那天傍晚他们夫妇正拿一点仅存的粮食准备做饭,突然一名孕妇领了两个孩子来到他店门口,两个孩子因饥饿快站立不住了,夫妇俩犹豫了一下,还是把粮食给了母子三人!传说左八郎夫妇是饿死的。而史籍中查不到他们离世的确切原因,但他们确系在这场大饥荒中去世,当地人口相传至今。粮商夫妇竟因粮荒而殒命,这是古今罕见令人扼腕叹息的个案!

“庇民侯”是宋徽宗加封的,史料有所记载。其实,左世裕终其一生是个粮店店主即小微企业主而已,作为一国之君的皇帝将一名平头百姓封为庇民侯爷,怕有其深层次考量:民为邦本。左世裕舍己救人的善举,利于国之基石的百姓,归根结底有利于“邦本”,即政权的巩固,社会的稳定,公序良俗的延续。或许也是对官员们的一种警示与提醒:一个平民在国难当头时尚能毁家纾难,作出利于邦本的惊世骇俗的举动,何况担有安邦定国责任的为官者乎!左八郎的善举确实震惊了朝野,宋徽宗命令打开官仓赈济灾民,并选址建造“左八郎庙”加以彰表。

百姓则将左世裕奉为神灵。国人向来有将偶像当作神灵供奉的习俗。“左八郎庙”建于“诚济”粮店附近的米市巷地段,共三进,初始规模宏大与灵隐寺相仿。此庙多次塌圮,屡圮屡建,明代曾有一次大规模修缮,而祭祀“左神”的香火旺盛且沿续千年,直到后来因城市改造而拆除此庙。左世裕所建左家桥,千余年中虽多次修缮,形制有所变化,但也一直在原址保留。“诚济”粮店在时光流逝中店主更迭,而“诚济”招牌却高挂了千余年,延续到上世纪五十年代才消失。

左世裕的善良,不是小善,而是舍身、毁家,善到极致、旷世。雨果道:善良既是历史中稀有的珍品,善良的人便优于伟大的人。写作此文时我追寻是什么原因让左八郎赋有了如此伟大的善良品性?是深入骨髓的教养?是纯朴的乡村习俗的熏染?还是与生俱来?在史料和传说中找不到答案。但左世裕确实将善良的火把高举了千年。人类的历史贯穿了真善美与假丑恶的厮斗、纠缠,善良有时被打压、挤兑、排斥,即便阴霾漫天寒凝大地,善良也会如雪下的草芽,寒枝孕育的蓓蕾,石缝中扎根的树种,冰层下涌动的潜流,顽强地存活生长,因为人类、社会需要善良犹如需要阳光。尤其当人们遭遇各种灾难祸害的时候,善良会释放出格外强烈的光亮和暖意,给人以温暖、希望和力量。

我伫立在流淌不息的运河岸边,“庇民侯”廊榭前,仿佛看到了千余年前发生的那些事,仿佛听到了从时光隧道传来的回声。

